

法国社会党的执政困境

彭姝祎 / 文

法国社会党自 2012 年当政以来，支持率一路下跌，几度跌破历史记录，最低时不足 20%，被媒体形象地喻为“跌无可跌”。2014 年以来，社会党在法国的三次选举以及欧洲议会选举中又接连败北，不敌在野的右翼大党人民运动联盟和快速崛起的极右势力“国民阵线”，令人唏嘘。此番执政，是社会党告别政坛 17 年之久后的首次执政，本欲雄心勃勃地做一番事业，改善民生，扭转近些年法国国力渐衰的局面；民众也对它寄予厚望，希望能改变右翼执政十余年，法国经济社会几无改善的局面，然而事与愿违，不断走低乃至触底的民意却折射出社会党面临的执政困境。

政治困境：

内忧外患、里外受敌

社会党的困境，首先表现在政治领域，奥朗德总统面临着党外反对派和党内激进派的双重压力。自 2014 年起，社会党在三次中期选举——市镇选举（2014 年 3 月）、参议院选举（2014 年 9 月）和省议会（2015 年 3 月）选举——中接连败北，不敌传统对手、在野的右翼大党人民运动联盟，也不敌正在快速崛起为法国政坛第三

大力量的极右势力“国民阵线”。市镇选举的失利使全国绝大多数大中城市落入了以人民运动联盟为首的右翼手中，改变了此前左翼在地方政治版图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参议院选举的失利使左翼丧失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与此同时，左翼阵营内部发生分裂，两名绿党成员因在核问题等一些议题上与政府意见相左，趁奥朗德在市政选举后重组政府之际退出了政府，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的决策造成了掣肘。同时社会党内部也发生分裂，其中的激进派即左翼中的左翼因持分歧意见而不再支持政府：在审议“2015—2017 年度经济计划”时，有 41 位社会党议员投了弃权票，削弱了社会党在国民议会中的多数地位。这也是政府为使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促进增长和经济活动的法案》即“马克龙法案”获得通过而不得不两度借助宪法第 49-3 条（即押上政府责任，让法案不经由国民议会投票而通过）来绕开极有可能投否决票的国民议会的原因。

概言之，一边是以保卫共和联盟和国民阵线为代表的强大的反对派，一边是分裂的左翼联盟；两大立法机构——参议院和国民议会，一个掌握

在右翼手中，一个因左翼阵营以及社会党本身的分裂而受到削弱，社会党的执政之路可谓荆棘密布。

经济社会政策：

市场还是国家，公平还是效率？

传统上，社会党在公平和效率的天平上倒向前者，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市场至上；重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作用，主张通过再分配手段确保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然而面对不断刷新纪录的低增长率、高失业率和巨额财政赤字，社会党不得不把工作重心聚焦于提高竞争力、打击失业，削减公共开支，确保财政稳健。从《责任公约》到《马克龙法案》，社会党推出的经济改革政策从忽左（如开征巨富税）忽右（如为鼓励企业雇工而降低企业缴费并将部分赋税负担转嫁给个人）到断然右倾，总理从保守的埃罗更换为“就算得罪左翼大佬也要务实变革”的瓦尔斯，经济部长从信奉国家干预的蒙特布赫更换为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年轻金融家马克龙，社会党最终倒向效率，并开出了放松管制、压缩公共开支，即弱化对劳工的过度保护来激活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

的药方。它推出的一系列改革，特别是2014年底出台的《马克龙法案》，在一定程度上放开周日营业，放宽铁路、高速公路建设和运营的定价权和运输条件，出售部分符合一定条件的国有资产，松动对解聘的限制等内容，而被视作“前所未有的右倾”，不仅受到部分左翼选民的炮轰，更引发左翼联合政府的进一步分裂，致使法案受到社会党内激进左翼的批评。如社会党议员阿米尔萨希称，执政党正转向社会自由主义或者说新社会自由主义。这迫使政府两度动用宪法第49—3条来避开可能投否决票的国民议会，强制通过了该法案。

在社会政策领域，在人口老龄化、经济下行和巨额财政赤字等现实的压力下，社会党也不得不步右翼后尘，进行紧缩福利的改革，把此前由国家大包大揽“生老病死”等人生主要风险的做法向由个人适当承担一定责任的方向改革，这使它非但无法兑现现在竞选阶段承诺的，废除右翼政府于2010年推出的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诺言（该承诺是社会党当选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还沿着紧缩的道路继续前进，如立法规定以渐进的方式提高领取全额养老金的缴费年限和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改革医疗、失业、家庭津贴等福利制度，朝着缩短住院时间、严控医疗浪费、削减失业金额和领取时间，变补助失业为鼓励就业、缩小家庭津贴的补助对象等方向发展。这些旨在压缩公共开支、降低财政赤字的措施受到诸如“出卖民众利益、背离左翼价值观、为成全资本家而牺牲雇员”的质疑，并失去了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支持：市镇选举中，左翼选民38.5%的高弃权率就是证明，这一创纪录的弃权率直接导致了社会党的败选。



在人口老龄化、经济下行和巨额财政赤字等现实的压力下，社会党也不得不步右翼后尘，进行紧缩福利的改革，这也招致国内民众的抗议示威。图为2015年4月9日，法国南方城市尼斯举行抗议紧缩政策游行。

移民问题：

普世价值还是国家利益

移民问题也凸显着社会党的执政困境。传统上，社会党持普世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主张宽容对待移民，但经济危机加剧了移民和原住民在就业和社会福利等领域的矛盾；此外，移民青少年学业的失败（移民青少年的学业失败率大大高于本土青少年）、移民青年就业的艰难（移民青年的失业率是本土青年的2—3倍）

和融入主流社会的困难等带来了众多社会问题。如有少数移民青少年以打砸抢烧等行为来宣泄对主流社会的不满，恶化了社会治安，致使民众怨声连连。而社会党坚持一贯的人道主义立场，强调移民的权利和对法国社会的贡献，主张多元文化同生共存，支持给予外国人投票权，反对重拳打击移民青少年犯罪而倾向于感化教育。凡此种种，法国社会党被抨击为置本国利益于不顾的乌托邦，很多民众甚

至怒而投奔高举“反全球化”、“反欧洲”、“反移民”大旗的极右势力。特别是2015年初的“查理周刊”血案^[1]后，法国社会的排外情绪进一步高涨，支持多元文化论的人数骤降至不足10%。民调预测，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总统大选中，社会党有可能不敌极右势力，难以进入第二轮投票。因此，如何平衡人道主义和现实的国家利益，如何兼顾人权和法治，都是摆在社会党政府面前的难题。

困境的根源

社会党陷入执政困境的根源首先在于，在全球化和欧洲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法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困境。二战之后，在当时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首的左翼政治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背景下，法国建立了完善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形成了对劳工阶层的有效保护，进而形成了以“高工资、高税收和高福利”为特征的“法式社会主义”。然而时过境迁，在全球化和欧洲经济一体化使竞争不断加剧的今天，法国模式日益面临严峻挑战：高福利来自高税收，高税收特别是过高的社保缴费推高了劳动力成本，重挫了法国企业的竞争力和雇工积极性。高福利下对劳工的过度保护使企业不敢轻易解聘员工，无法吐故纳新，使劳动力市场陷入僵化，失业率居高不下。高福利的基础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合理的人口结构（即劳动人口多于退休人口），但经济的持续下行和人口的加剧老龄化（老龄化进程从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使国家渐渐无力承担日益增长的巨额福利开支，财政赤字巨大，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接连打击下，法

国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失业率持续高企，公共债务从1981年的22%飙升至2012年的90%，财政赤字剧增，债台高筑，综合国力跌出世界前五名。

概言之，现实的经济社会压力不断挤压社会党政府的决策空间和手段，使之不得不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在很多政策上向右翼看齐。社会党在当政之后整整半年内的无所作为凸显了这一点：当时新政权翻来覆去地讨论同性恋能否结婚、性骚扰如何定罪、中央官员能否兼任地方官等问题，对事关国计民生的“就业”和“增长”等却只字不提，导致民意骤跌——奥朗德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史上支持率下降最快的总统，还引爆了民众对社会党执政不力表示不满的大游行。实际上奥朗德的“避重就轻”在一定程度上系“有意为之”、“转移视线”。因为正如媒体所言，在法国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面前，左派的奥朗德总统除去采用他所猛烈抨击过的前任右翼的经济政策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而批评之声尚在耳就步右翼后尘，无异于掴自己的脸。左翼进退两难的困境可见一斑。

其次在于选民结构的改变。传统上，社会党的选民基础是产业工人，1981年把社会党首次送上执政地位的中坚力量便是他们，当时的产业工人占法国经济活动人口的37%，社会党72%的选票来自于此。但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产业工人大幅度萎缩，与之相伴随的是法国社会结构的中间化和多元化。选民也从“两极”化不断走向多样化，“脚踏两只船”，即在社会价值观上认同左翼、在经济价值观上认同右翼的选民日渐增多。为适应这一新现实，确保选票和上台执政，社会党的政纲也日趋中

间化、多样化，想兼顾效率与公平，逐渐淡化了与右翼的分野，这也是社会党前领袖若斯潘的名言——“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来源。然而左右逢源的做法未必左右讨巧，由于立场模糊，态度暧昧，相反倒有可能适得其反，导致左右翼选民都不买账：如奥朗德在执政半年后推出的经济政策，就被认为是忽左忽右，方向不明，在右派看来改革力度小，不能有效提振经济；在左派看来则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牺牲民众，致使社会党的传统选民，即在全球化冲击下被边缘化的产业工人纷纷投奔“反全球化”的极右势力。而奥朗德经济政策的最终右转，则进一步引发左翼选民的指责和左翼内部的分裂，面对左翼选民对社会党的经济政策为何与右翼如出一辙的质问，社会党“若不如此，如何能恢复增长、保持执政地位”的回答凸显着该党进退两难的困境。

法国社会党的执政困境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摆在西欧社会民主党面前的普遍难题。换言之，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背景下，如何兼顾公平和效率、如何调和理想和现实、如何平衡普世的人道主义和眼下的国家利益，是西欧左翼面临的普遍挑战。在社会党的治理困境背后，是其深刻的身份危机，“我们是谁”、“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和右翼的区别到底在哪里”，社会党人亟须重新思考这些基本命题，在理论层面推陈出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查理周刊事件：2015年1月，法国的讽刺漫画周刊《查理周刊》编辑部遭到两名北非裔移民青年的袭击，袭击造成12人死亡，起因是该刊用漫画的形式讽刺穆罕默德先知。